

地下室里的老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研究 ——以山东省临沂市C社区为例

卢义桦,陈绍军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摘要:新型城镇化“遭遇”老龄化使得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面临着愈发复杂的局面,并出现一些特殊问题。住在地下室的农村老年人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所面临的养老困境既有普遍性亦兼特殊性。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村老年人住地下室这一特殊现象,以山东省临沂市C社区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住地下室农村老年人面临着生计、生活、制度和精神四个层面的养老困境,并从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全面解读了养老困境发生机制,最后提出构建多元化养老途径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老龄化;养老困境;养老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社区变迁及秩序重建研究”(15BRK0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变迁研究”(2015B087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2015B40114)。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7)06-0080-07 **收稿日期:**2017-03-06

作者简介:卢义桦,男,山东临沂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移民社会学;陈绍军,女,江苏六合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移民社会学。

DOI: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7.06.011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5亿人,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1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6.1%。在城镇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一个新高峰。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我国201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比2014年上升0.6个百分点,比2010年高出2.8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型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双高”和“双快”的趋势^[1],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新型城镇化“遭遇”人口老龄化时,老年人就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利益相关群体^[2]。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大规模地迁移流动到城市的结果必然会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进程反而加快农村老龄化,从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3]。与城镇人口老龄化相比,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而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障却愈加薄弱^[4]。

在新型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叠加”冲击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面临着愈发复杂的局面,并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如老年人住地下室问题^①。笔者在山东省临沂市C社区调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时,发现有很多老年人居住在地下室,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农村老年人从村落搬迁安置到社区,为何会住在楼房的地下室中?他们面临着怎么样的养老困境?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吗?在百度搜索键入“老年人住地下室”等关键字,共有约152万个相关结果^②,其中不乏关于“老年人住地下室”的

①“老年人住地下室”并非仅指老年人居住在地下室,是指老年人居住在社区居民楼下的地下室、车库、储藏室等社区规划中的非适宜居住空间的活动总称。

②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上午9点20分。

报道,且在全国多地均有案例。不断见诸报端的“老年人住地下室”现象说明了该问题日趋严重,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与在大城市蜗居地下室的打工族不同,因“农民上楼”而产生的老年人住地下室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城镇化与老龄化研究领域的交叉问题。本文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居住于地下室的农村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基于主体性视角对居住地下室的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养老困境进行主位式考察,主要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住地下室老年人养老困境的现状,包括生计困境、生活困境、制度困境和精神困境等四个层面;其次,住地下室老年人养老困境的发生因由,即从作为行动主体的老年人视角出发剖析养老困境的发生机制;最后,提出构建多元化养老途径的应对策略。

本文的经验资料来源于笔者2016年3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临沂市C社区的三次田野调查。C社区是新型农村社区,于2010年由CY村、CE村、CS村、BJ村和KY村5个行政村规划整合而成,社区规划容纳2478户,10356人。从人口结构来看,C社区有老年人(60岁及以上)1635人,约占总人口的15.8%;劳动力人口5876人(16~59岁),约占总人口的56.7%。从年龄结构来看,社区人口最小年龄为1岁,最大年龄是92岁,平均年龄46岁。另外,C社区户籍为农村户口的村民所占比例为92.8%。笔者调研期间采取个人访谈法对C社区26位住地下室老年人、10位村民和3位社区干部等共计39人进行深度访谈,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对住地下室老年人的社会生活及其与子代互动进行全方位考察。本文所使用的经验资料均来源于田野调查期间所整理的访谈资料及观察记录。

二、从村落到社区:住地下室老年人养老困境的现状

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的建成,老年人从分散居住的平房或低层小楼房迁移到集中居住的楼房或小高层,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养老问题也出现新的变化。对于居住于地下室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其所面临的养老困境包括生计上的收入减少与支出增加,生活上的基础设施不足和缺乏日

常照料,制度上的行政吸纳欠缺及权利诉求困难,精神上的休闲娱乐匮乏及传统孝道式微等方面。

(一) 生计困境:收入减少与支出增加

收入多寡直接决定着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水平。一般而言,农村老年人的生计来源包括种地、农村养老保险、打零工散工、子女给予等多种方式。新型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计模式,促使老年人进行生计转型,使得一些老年人面临经济困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计危机”。一方面,一些老年人因“资本下乡”农田规模化经营而导致的土地流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有一些人因从村落到社区居住空间地理位置变化所导致的耕作半径增大而无力耕地。另一方面,搬迁到社区后,老年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内容日益被彻底商品化,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生活压力不断增大^[5],在一些新型农村社区,甚至出现老年人以“占地种菜”的方式来缓解生计危机的现象^[6]。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来应对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化冲击,但老年人“弱劳动力”特质使他们缺乏工作机会,很难在现有劳动市场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村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传统的子代对亲代的“经济反哺”功能始渐弱化。概言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所面临的生计困境表现在收入来源的减少,以及生活成本支出的增加。

住地下室的老年人所面临的生计困境往往比一般农村老年人更加严峻,他们中一些人收入来源单一,甚至有的老年人连自来水费都出不起,需要每周到附近未搬迁村庄的亲戚朋友家打井水。面对着商品经济时代不可逆转的到来,他们选择节衣缩食来应对,并表示出了对未来的担忧。“俺也没有收入来源,家里没有耕地,就是靠着国家发的每月80块钱^①、租地的500块和自己编草帽卖点钱来过活。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一个住在俺的上面1楼,另外一个住在前面那栋楼。他们自己家有小孩养,哪有钱再给俺。过年时会给俺200块钱。俺一个老嬷嬷(方言,老太太的意思)生个炉子做点饭喝点粥,买点米面的就行,其他的买不

① 山东省有关政策规定,年满60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本人不缴费也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80元,比国家每人每月55元的标准高出25元。

起。现在不比以前了,以后的日子以后再说吧。”(20160316-CY-01 李大妈)从李大妈话语可得知,她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国家发的基础养老金、土地流转费、零星手工活及儿子给予的过年费,收入水平较低,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这也反映出C社区内住地下室老年人普遍面临的经济困境。

(二)生活困境:基础设施不足和日常照料缺乏

生活困境是指农村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抑或“过日子”所遇到的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困难境遇。居住于空间狭小的地下室里的老年人首先面临着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这对本当颐养天年的老年人来说是一个被迫接受的生活挑战。地下室本应是相对封闭且用于存放杂物的储藏空间而非居住空间,在空间设计上必然不会营造生活所需设施。一般而言,地下室会通电线,但不会有自来水和燃气灶,也不会有卫生间和排气扇,有的地下室甚至连窗户都没有。而且,地下室通常阴暗潮湿,给人空间压抑的感觉。因之,老年人住在地下室,必然会面临着诸多生活上的不便,糟糕的环境会引发老年人负面情绪体验,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现在过日子不如以前在村里舒服咯,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水没气,厕所还是俺们几个人在社区外面盖的,就一个,混用的,都是老年人了,走过去也挺远的不方便。晚上睡觉拉上铁帘太闷了,冬天生炉子都怕煤气中毒。而且整天潮乎乎的,一股子霉味。太窄了,东西放不下。反正,生活不如在以前住村里大院子方便。”(20160712-CY-03 王大爷)王大爷的话语体现了他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诸如地下室不通风透气、上厕所的不方便等。C社区由5个村庄合并而成,“农民上楼”是短时期内发生的社会事实,必然出现奥格本所言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即文化变迁滞后于物质变迁。老年人迫于生存压力住进地下室,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是在之前村庄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住地下室老年人生活困境还表现在缺乏子女的日常生活照料。从人口迁移与流动视角来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过程,

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导致“农村过疏化”^[7],老年人逐渐成为农村留守人口的主力军。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加快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解体,亦即亲代失去了子代在生活上的照顾。正如社区张大爷所言:“俺儿和儿媳妇在上海打工呢,一年就回来一两次吧。女儿嫁到邻镇了,一两个月过来看俺们一次吧。平时都是俺们老两口互相照顾,不指望儿女能多么照顾俺们。他们也忙着操劳自己的家,俺们老年人只要能动就自己照顾自己,苦点就苦点吧。”(20160716-BJ-01 张大爷)

(三)制度困境:行政吸纳欠缺与权利诉求困难

从制度层面来看,老年人在搬迁安置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是缺乏“行政吸纳政治”^①。作为国家视角下的社会工程,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重工程轻社会”的特征,在搬迁安置及社区营造政策制定中忽略了不同群体需求的多样性,未能考虑到农村老年人对于居住空间的需求,如C社区在“购房指标”原则上以宅基地为基本单位,一处宅基地只可换购一户楼房。但早在10多年前,5个村就不再给村民分配新宅基地。因之,购房指标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在新社区购买两套房子。而且,C社区建设的老年保障房的数量也有限,如CY村只建设了20套老年保障房(有独立小院、但是占地面积少,约50平米,一室一厅一院的格局),无法满足大多数老年人的居住需求。质言之,在社区规划及制定搬迁安置政策时,政府未能在充分考虑不同群体尤其是老年人居住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老年保障房数量与老年人居住意愿的背离。“老年房都是有关系的老年人住进去,交8000块钱押金可以一直住。村里老年人这么多,这点房子肯定不够。俺们也不是要求非得住房子,哪怕给俺们一个条件好点的老年楼房,我们住也行啊。希望以后政策好点,能盖老年楼房,让俺们有个好的养老地方。”(20160512-CY-02 李大妈)李大妈的话语道出了绝大多数住地下室老年人的心声,希望社区规划

①“行政吸纳政治”由香港社会学家金耀基提出,“是指通过行政渠道将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汇聚起来共同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通过这一模式,行政决策呈现出开放性与参与性,行政决策不再仅仅是少数决策者的行为结果,同时也是大众参与的结果。”

和制定相关政策时能充分考虑到老年人对养老居住空间的特殊需求,能够吸纳他们合理的意见,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

对于生活于社区中的老年人而言,他们也面临着权利诉求难以实现的困难。“俺们想在社区打井吃水,但是村里不让。向他们反映小区没有厕所,说了好几次,就是没人来做,后来还是俺们大家一起出钱,老王他们盖的。这些事都是村里推脱说没钱,也没这个规定,最后还是俺们自个儿做,光反映没用。”(20160712-CY-02 赵大妈)老年人是社区生活的“主力军”,但住地下室的老年人是社区生活的“边缘人”,他们在社区中处于底层地位,权利诉求难以被重视更难以实现。由于话语权缺失,他们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其利益诉求无法在政策或制度层面得以充分表达。

(四)精神困境:休闲娱乐匮乏及传统孝道式微

搬入社区集中居住后,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并未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公共娱乐活动反而愈发单调化。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休闲娱乐活动有看电视(48.8%)、串门聊天(24.6%)和打牌下棋(11.5%),其他的娱乐活动较少,呈现出单调化特征^[8]。住地下室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单调,生活图景相对固定。正如赵大爷所言:“以前大家找场一起打牌,一块在小卖部门前拉呱,现在住地下室不方便了,小卖部也离得远,出去走动都少了。村里组织的老年人活动也少,就是拉呱,晒太阳了。(20160712-CY-01 赵大爷)。”而且,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安置模式打乱了村落时期的地缘关系,进社区后老年人原有的社会网络断裂,不再与之前的邻居相伴而居,“半熟人社会”驱使老年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年人的社会融合,导致了老年人群体性孤独。

老年人所要面对的精神困境还有传统孝道的式微^[9]。新型城镇化是我国为实现快速现代化而推进的社会性工程,是现代化高速浓缩的过程,改变了原本自然状态下村落发展轨迹,实现了从村落到社区连续谱上的跨越。物质空间层面的急剧变化促使村民从社会变迁的“幕后”走向“前台”,使得村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由“渐发缓变型”直接转成“急发突变型”,同时带来了农村原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对于居住于地下室的

老年人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与子代“时空分离”而导致的传统孝道的嬗变^[10]。一方面,青年农民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在功利经济、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重利轻义的做法。另一方面,子代因“身体不在场”无法与老年人面对面沟通并进行生活照料,只能通过电话、视频方式来精神宽慰,出现家庭伦理道德淡薄和重幼轻老现象^[11]。传统“孝”的内涵和方式在发生了变化甚至异化,这是秉持传统思想的老年人无法接受的,增加了他们负面情感体验,使他们陷入了精神困境。

三、养老困境的发生机制

作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业已发生的社会事实,老年人住地下室现象的出现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首先,从社区层面来看,新型城镇化所导致的居住空间集聚是诱始因素;其次,从家庭视角来看,现代性冲而导致的家庭关系嬗变是关键因素;最后,从个体层面来看,老年人个体意识觉醒所导致的自我隔离是助推因素。

(一)社区层面:物理空间的强制变迁

从空间社会学来看,作为制度安排的城镇化是一场国家视角下现代性的空间生产过程^{[12][13]},物理空间的强制性变迁带来了住宅空间分化与社区空间重构^[14]。传统村落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被打破,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空间重组与社会关系再造^[15]。在空间正义视角下,由精英阶层掌握空间生产的过程及规则,他们头脑中“科学理性”决定了以老年人为主的社区生活主体未来的空间体验。在这场声势浩大且不可逆转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伴随着空间重组发生断裂,而且,不同类型的群体获得的空间感也有所不同。物理空间的强制位移首先使农村老年人被迫失去了原来村落的宅院,不得不在新社区中购买楼房,“被卷式”进入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由于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购买楼房,绝大多数的老年人不得不花光毕生积蓄甚至还需借款或贷款购买楼房。存款养老的钱没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光景也不再,让农村老年人失去了吉登斯意义上的本体安全性^[16]。

居住空间变迁会导致家庭居住格局变化,并引起家庭内部居住空间的再分配^[17]。在此过程中,

一些老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楼房或给子代买好房子后没有更多的资金再给自己购买楼房,不得不选择住进地下室,这是他们在既有社区和家庭空间结构中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俺家以前宅基地有3分地,拆迁补偿款一共4万多,买的3楼房子100多平方米给俺儿子结婚用了。花了10万多,除了补偿款4万,把家里存款4万5拿出来,又借了点终于凑够了。哎,交了房子钱就没钱了,一辈子存的钱都不够,还欠别人钱呢,更别说再买一套房子了。如果还在以前农村,咱还用这样么,房子是盖好的,住着也舒坦,不用像现在这样挤地下室啊。现在什么都需要花钱,以前有院子还能种点菜,现在菜都得买。”(20160712-CY-01 赵大爷)从赵大爷话语中可知,正是居住空间的改变让他不仅几近掏光了毕生的积蓄,也被迫选择居住在地下室。在这场空间重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在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态势,一些未能住进作为“稀缺资源”老年安置房的老年人不得不屈服于业已生产的空间结构安排,这也是导致其养老困境的始因。很多老年人在温存乡村记忆的同时也发出了感叹:“要是不进社区,住在以前房子里多好!”而且,空间再造过程中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生活及休闲的特殊需求,出现了各种养老设施不足及配套养老服务的欠缺。同时,空间集聚过程也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过程,“熟人社会”运作规则效用递减,村庄闲话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村庄出现解体趋向,没人过多关心老年人住地下室现象,生产了村民“一切只能如此”的意识。

(二)家庭层面:代际关系的急剧嬗变

在传统社会中,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家庭养老是中国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费老提及的“反馈模式”是其基本特征^[18]。家庭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家庭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使其老有所养;另一方面家庭也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和情感表达的主要场所,使其老有所居。中国式家庭养老模式既能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也能给其带来情感慰藉。但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生剧烈嬗变,并呈现出新的特点^{[19][20]}。一方面,历经计划生育政策后,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出核心化、小

型化趋势,“多儿多女”共同养老的模式已日趋远去。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侵入和传统孝道的式微,打破了传统的“抚育—赡养”模式,家庭资源的分配出现代际下移现象^[21],老年人在家庭事务决策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趋于边缘化。“俺有一儿一女,儿子住在社区,女儿嫁到县里了。当时俺们家就一处宅子,刚开始一块住,后来儿子结婚了我们就搬出来了,住地下室分开过日子了。当时,买房子用的俺们攒的钱,房子本来就是给儿子结婚用的,我们没怨言。现在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妇和孙女住这里。俺们不要他们的钱,孙女上学需要钱,他们年轻人人情世事多。”(20160718-CS-01 吴大妈)从吴大妈话语可知,她和老伴以花钱给儿子买房的方式实现了家庭资源的代际传递,他们在经济上所剩无几,而子代家庭需要将更多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和人情往来上,对他们的经济和情感支持极其有限。虽然吴大妈表示理解儿子的难处,但笔者访谈时发现她还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

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指出,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老年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22]。而且,为避免因与子代家庭共同居住而可能产生的家庭矛盾,以及满足子代对于家庭空间私密化的需求,老年人会选择搬去地下室住。因此,代际关系嬗变带来的影响在C社区居住空间层面表现为老年人独居尤其是住地下室老年人所占比例的上升。老年人住地下室而子女住楼上所导致的居住空间隔离会造成家庭情感功能淡化,正如杨大爷所言,“现在就觉得子女来看俺们就像是走亲戚一样,不住住在一起了,感情不如以前大宅子里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近了。”(20160318-BJ-01 杨大爷)

(三)个体层面:老年人的自我隔离

从个体层面来看,住地下室老年人的主体性因素是造成其养老困境的助推力量。老年是人生最后的生命历程,老年人的生理机能由强盛走向衰退^[23]。生理衰退给老年人带来的是劳动能力的减弱及劳动机会的失去。老年人无法像青壮年劳动力一样做重体力活,因之也失去一些打零工的机会,在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时也觉得力不从心。更有一些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及其他长期病等,医

药费就占据了很大一笔开支,生活质量再度下滑,甚至出现生计危机,仅仅能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与之相应,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不断缩小,社会交往能力缓慢下降。从实地调研的经验感知来看,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封闭,对于一些新鲜事物也持冷漠态度,处于“孤岛”的状态。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往往是楼前楼后的同住地下室的老年人,除了偶尔的走亲访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在社区慢慢度过。

当笔者问及老年人为何会住地下室时,除了回答“没钱”之外,回答“不给儿女添负担”和“不方便”的老年人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俺们老年人不能赚钱了,得过且过,过一天是一天,儿女和孙子不一样,他们在外面做什么都得花钱。我们紧皱着点,他们就能好过一点。”(20160716-BJ-01 张大爷)从张大爷的叙述中可知,他认为老年人无法再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可以,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不高。而且,出于期望子女过得更好的愿望,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不愿依靠子女获得物质支持,倾向于自我生活照料。另一方面,“不方便”说明老年人自我对与子代同居有可能引起的家庭矛盾有着明确的预判,老年人清晰地知道他们与子代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代沟,只能主动选择放弃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被迫“自愿”住进地下室。

四、“养老困境”破解之道:构建多元化的养老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住地下室问题是在社区养老资源紧张情境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习总书记强调:“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显然,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对于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特殊问题亦应引起特别的关注,以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农村老年人居住在地下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发展,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文从主体性视角对住地下室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进行研究,发现其在生计、生活、制度和精神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面系统全面地解读了其养老困境的发生机制。基于住地下室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表现及其发生机制,应当积极探

索构建多元化的养老途径以寻求破“困”之道,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使老年人“老有所居、老有适居”。在此,本文从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体四个层面略谈一下如何解决住地下室老年人的养老困境。

一是作为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责任主体的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加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的“软件”建设和养老载体的“硬件”建设,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和区别化的养老服务,实现农村社区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农村社区养老保障水平。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新型城镇化制度安排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养老诉求。在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特别是贫困老年人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机构养老及社区养老体系的建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养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二是社区营造应当充分吸纳老年人的合理需求,在进行社区规划期间应当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访谈等多种方法了解老年人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的需求。其次,社区空间营造应当考虑到社区人口结构因素,在充分征求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养老用地和设施建设规模,规划并建设数量充足的老年保障房,避免出现老年房供不应求的情况。再次,通过营造文化广场、凉亭等公共空间以及提供多元化服务重塑社区的公共性^[24]。同时,开展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并让老年人能够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是弘扬孝道文化,让家庭代际关系走向契合。李密在《陈情表》中一句“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道出了孝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政府强调以孝文化治理基层社会的原因。在精准扶贫的地方性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孝道扶贫”的理念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孝文化对改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紧张及巩固家庭养老功能的作用明显,可以通过加强宣传与教育、树立孝子典型、塑造公共舆论、强化执法力度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孝道文化的复兴^[25]。

四是通过社会工作介入的方式实现老年人的自我发展。作为“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农村养老服务能够发挥整合社区资源一体化、保

障老年人利益最大化,对于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作用^[26]。社会工作者可以给老年人提供物质帮助和情感支持,整合社区资源建设社会支持系统,满足老年人的多样性需求,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胡小武.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时期的中国养老模式转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36-143.
[2]田鹏,陈绍军.从村落到社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以河南省新乡市Y社区为例[J].西北人口,2016(4):75-81.
[3]童玉芬,王静文等.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4(12):157-161.
[4]曾毅,柳玉芝,萧振禹,张纯元.中国高龄老人的社会经济与健康状况[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6-15+176.
[5]叶敬忠.留守人口与发展遭遇[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12.
[6]卢义桦,陈绍军.农民集中居住社区“占地种菜”现象的社会学思考——基于河南省新乡市P社区个案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7(1):134-140.
[7]饶传坤.日本农村过疏化的动力机制、政策措施及其对我国农村建设的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147-156.
[8]李俏,朱琳.农村养老方式的区域差异与观念嬗变[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3-102.
[9]潘剑锋.论孝道在我国农村养老中功能弱化的原因及其防范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9(3):59-62.
[10]左冬梅,李树茁.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1(2):93-100+127.
[11]熊茜,李超.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模式向何处去[J].财经科学,2014(6):125-132.

[12]郭文.“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J].经济地理,2014(6):33-39+32.
[13]钟晓华.社会实践的空间分析路径:兼论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生产[J].南京社会科学,2016(1):60-66.
[14]孙秀丽,马春东,唐建.乡村住宅空间分化与社区空间重构[J].城市规划,2015(9):40-44.
[15]谷玉良,江立华.空间视角下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山东省枣庄市L村“村改居”为例[J].人文地理,2015(4):45-51.
[1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黄平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5-118.
[17]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龚晓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9-150.
[18]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33
[19]吴帆,李建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J].学海,2010(1):35-41.
[20]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J].江淮论坛,2011(2):122-129.
[21]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J].社会,2016(1):186-212.
[22]朱静辉.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J].西北人口,2010(3):51-57.
[23]钟涨宝,杨柳.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22-28.
[24]吴业苗.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与变异——兼论农村社区服务在建构公共性上的作用[J].中国农村观察,2014(3):57-64.
[25]杨清哲.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文化视角——以孝文化破解农村养老困境[J].科学社会主义,2013(1):105-107.
[26]廖鸿冰,李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4(6):121-124.

Agedness in the Basement: Study on the Plight in Old-Age Life of Aged Population in Count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n C Community in Linyi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LU Yi-hua, CHEN Shao-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Abstract: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encounter" aging causes the rural aged population faced with more complicated situation and some special problems. The rural elders living in the basement are the special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proces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hey are faced with both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plight in old-age life.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phenomenon of the rural elders living in the basement, and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 Community in Linyi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 plight in old-aged of the rural elders who living in the basement including such four layers as live hood, living, system and spirit; and expound comprehensively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rural old-age plight including such three layers as community, family and individuality;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coping strategies by building diversified old-age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Aging; the Plight in Old-Age Life; Old-Age Care Solutions